

北魏平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吴晓亮, 曹宇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北魏平城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拓跋鲜卑入主中原, 保留传统游牧经济同时, 积极发展农业, 经济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这些活动不仅适应政权的发展需要, 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后世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北魏政府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北魏平城; 游牧经济; 农业经济; 经济开发与环境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2)02-0084-06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 开启北魏前期以今大同地区作为统治中心的时代。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 近一个世纪, 京畿地区发展开北魏社会经济转变之风, 见证了北魏前期政治中心南移与拓跋鲜卑走向汉化的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段里, 北魏的社会经济逐步从游牧经济为主转而开始采用畜耕并重的生产方式, 农业有了初步发展。统治者不断适应并接受农耕文明, 主动调整经济结构, 学习效仿中原文化, 推动了雁北地区的开发进程。这些活动不仅适应政权的发展需要, 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后世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试探讨平城时期北魏经济结构转型。

一、平城早期开发与鲜卑游牧经济

(一) 北魏以前平城地区发展概况

平城地处雁北, 位于古代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沟通交融的过渡带上。春秋时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1]卷110《匈奴列传》林胡、楼烦皆是北方游牧民族, 属北狄系统。这些民族与当时其他游牧部落“各分散居溪谷, 自有君长, 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 然莫能相一”^[1]卷110《匈奴列传》, 互不隶属, 散居于陇西至燕北一带。

目前文献所见最早对平城地区行使行政管辖权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 习骑射, 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 自代并阴山下, 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

郡。”^[1]卷110《匈奴列传》武灵王为实现富国强兵, 积极推进胡服骑射改革, 倡导汉人着胡服、习骑马、练射箭, 与此同时开疆拓土、修筑长城。为加强北部边防、维持统治, 赵国在长城以内设置云中、雁门、代三个边郡并建有城邑, 其雁门、代地多在今大同地区。

史料称, 赵国李牧驻守边防时, “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输入莫府, 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士, 习骑射, 谨烽火, 多间谍, 厚遇战士。”^[1]卷81《李牧列传》从经济史的角度看, 这条资料记载了赵国有就地收取租税的状况, 说明政府对该地得以实行有效管理。“日击数牛”建立在牲畜众多的基础上。“习骑射”表明该地地域广大, 这是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形态才会呈现的情景。又有史料记载, 当赵国改用主动出击的国策后不久, “数不利, 死亡多, 边不得田畜。”^[1]卷81《李牧列传》其中的“田”、“畜”二字同时出现, 说明赵国边地除有游牧经济外, 尚有农耕。尽管我们不大清楚农业所占比重具体为多少, 但从数年后“选骑得万三千匹”^[1]卷81《李牧列传》以及“大纵畜牧, 人民满野”^[1]卷81《李牧列传》的记载不难看出, 当时雁北地区游牧经济相当兴盛, 显然占居主导地位。

秦汉时期, 平城城池的记录逐渐清晰起来。秦统一六国, 设置平城县。公元前200年, 汉高祖刘邦抵御匈奴进攻, 镇压韩王叛乱, 亲自率军北上, 史书上有“会天寒, 士卒堕指者什二三, 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 七日而後罢去”^[1]卷8《高祖本纪》的记录, 平城显然是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此役即

【收稿日期】2011-11-20

【作者简介】吴晓亮(1956-), 女,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著名的白登之围。司马迁记载“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1]《卷110《匈奴列传》》据学者研究，白登山，今马铺山，秦汉平城县遗址即位于距马铺山西南7里的操场城及周围一带。^[2]据考古发掘资料也可以看出汉魏平城城池的一些情况：2007年，在操场城北街东侧发现有北魏太官粮窖遗址，其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瓦当，其中书写有“平城”二字。^[3]瓦当上多饰有卷云纹的做法，“与秦都咸阳遗址，西汉京师仓遗址出土的方格云纹瓦当相同”^[3]，说明大同地区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深受汉文化影响。

东汉末年，边塞南移，陞北之地弃为荒徼，史称“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4]《卷14《河东道三》云州条》，平城成为塞外之地。受战争等因素影响，平城发展陷入低潮。直至晋朝代国时期，大同地区经济发展才又重新活跃起来。

(二) 拓跋鲜卑早期经济发展模式

北魏政权建立者拓跋鲜卑最初并不居于雁北，因此，认识北魏经济形态转变不仅需要了解北魏以前大同地区的开发史，还需对拓跋鲜卑历史时期经济形态作简要梳理。

据文献记载，鲜卑大约兴起于东汉。鲜卑早期远离汉地，“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馀国争衡，未有名通於汉，而由自与乌丸相接。”^[5]《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东汉光武帝时，“南北单于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5]《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这时史书中才出现“鲜卑”的字样。

鲜卑是属于东胡系统的北方民族，居乌桓以北，“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5]《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乌丸，即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在生活习俗上，乌丸“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5]《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据此可知鲜卑习俗与乌桓同。在物产方面，鲜卑发祥地“其兽异於中国者，野马、羝羊、端牛。端牛角为弓，世谓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豹、罽子，皮毛柔糯，故天下以为名裘。”^[5]《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自古以来，善骑射、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习俗是狩猎、游牧经济的产物，野马、羝羊、端牛等动物也表明当地自然条件适宜开展狩猎、放牧活动，由此可知鲜卑早期的经济结构应是牧猎经济为主的。

鲜卑的南迁西徙与乌桓、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衰落或迁徙有密切关系，鲜卑基本上是以填补原住民故地的方式在迁徙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我们知道，拓跋鲜卑是鲜卑族的一支，因地处鲜卑分布地区东北角，又称“北部鲜卑”。史书记载拓跋鲜卑“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狩猎为业。”^[6]《卷1《序纪》》当代学者通过大兴安岭嘎仙洞石刻的考古发掘认定拓跋氏最初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7]《P59-60》

拓跋鲜卑在立足中原前，曾经历数次大规模迁徙。公元一世纪时，“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6]《卷1《序纪》》大泽，即今达赉湖。当时，正值匈奴势力走向衰落，于是，拓跋鲜卑乘隙进入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另一次迁徙在献皇帝时，正值东汉王朝的桓、灵统治时期。根据史书记载，推寅后经6世，第7代“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6]《卷1《序纪》》“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6]《卷1《序纪》》

公元220年，拓跋力微即位，其在位57年，对后来拓跋鲜卑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6]《卷1《序纪》》一系列活动确立了拓跋氏的领导权。此后，拓跋力微重视与曹魏发展友好关系，“聘问交市，往来不绝”^[6]《卷1《序纪》》，不仅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也密切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为后世胡汉交流打下基础。“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6]《卷23《卫操传》》这些归属拓跋的晋人多为北魏军事强盛、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晋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拓跋猗卢（力微之孙）“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平城自此作为拓跋鲜卑的“南都”后，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在经历短暂的代国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珪“帝即代王位”^[6]《卷2《太祖纪》》，“夏四月，改称魏王”^[6]《卷2《太祖纪》》，北魏建立。

从上述勾勒的拓跋鲜卑历史线索分析，对其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部族的迁移，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从大兴安岭北段迁到呼伦贝尔草原

再到阴山一带,尽管其居所有较大的空间变化,但所经历的地域皆是游牧经济区,故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以前,拓跋鲜卑以游牧经济为主,基本维持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北魏开发平城与经济结构转变

(一) 农牧业交错和农业发展

北魏建立政权后,经济发展日益显现出重视农业、维持牧业,农牧交错发展的倾向。

早在北魏迁都平城前,统治者就已开始逐步发展农业。史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6]《卷110《食货志》》北魏建国之初,其统治地区经受战争创伤,满目疮痍,亟需采取必要措施恢复生产。统治者积极组织农业生产,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修复战争创伤、解决衣食所需的必要途径。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6]《卷2《太祖纪》》所谓“息众课农”即是采取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这一措施使得阴山之阳,黄河以北出现“务农息民,国人悦之”^[8]《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的安定局面。史料记载还说,“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朔方塞外,为屯田。”^[6]《卷110《食货志》》拓跋珪“命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朔方塞外,分农稼,大快人心”^[7]《卷15《昭成子孙传》》。这些措施,必然促进北魏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

为有效统治鲜卑各部,发展社会经济,北魏道武帝三次推行离散诸部政策。这是一次艰难而痛苦的蜕变。当代学者认为,离散诸部是道武帝解决部落问题的一个具体步骤,其目的是将君长大人和部民变为拓跋氏统治下的编民。^[9]《P39》史料记载,拓跋珪首次离散部落选择了拓跋鲜卑的北都——盛乐。“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6]《卷113《官氏志》》但由于这一地区部族生活习俗顽固,阻力较大,收效甚微。第二次则有所不同,即卫王仪屯田河北时在河套地区展开。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有“农耕”基础的区域内实行的措施,其实现“离散诸部”的目的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天兴初年,拓跋珪在繁峙更选屯卫,其后凡“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军长大人皆同编户”^[6]《卷83《贺讷传》》。拓跋鲜卑经过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编户等措施,逐渐改变着鲜卑人过

去那种相对分散的部族统治方式、改变那种逐水草而居的习俗。这个曾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以部族统辖各部的民族,在不长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其民众从部族所属向国家编户的转变,使逐水草而居向定居农业转变,意味着北魏政权走向成熟、走向发展。

“徙民”、“移民”是古代统治者发展经济、稳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北魏迁都平城前的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正月,道武帝“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6]《卷2《太祖纪》》,“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6]《卷2《太祖纪》》这条史料中所指的山东6州之民及百工技巧,皆出自农业社会,前者成为北魏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后者可为城市建设、生活的丰富多彩提供技术支撑;而“计口授田”就成为北魏政权恢复经济、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

为促进农业发展,北魏统治者还“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6]《卷110《食货志》》。“躬耕籍田”形象地描述了一个谙熟游牧狩猎的鲜卑统治者,此时已接受中原王朝帝王那种视农为本的理念,以躬耕籍田鼓励本民族发展农业经济。应当说,北魏统治者的鼓励与动员必然有效推动鲜卑族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后便宜行事,部分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并使原有畜牧产业补充着农业经济。他们在对外扩张活动中大肆掠夺牲畜,积累物资。史料载“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6]《卷110《食货志》》天兴二年(公元399年),“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进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馀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6]《卷2《太祖纪》》这些掠夺来的牲畜被王朝占有,大量的马、牛、羊不仅充实了国库,还“班赐从臣各有差”^[6]《卷2《太祖纪》》。另一方面,他们“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6]《卷2《太祖纪》》北魏统治者利用高车降民建筑鹿苑,作为蓄养动物的圈地,以保持狩猎习俗。

对于归附平城政权的各游牧部落,北魏统治者给予足够重视,一方面给予物资、官位的优惠,另一方面尊重其原来的习俗。以高车为例,“寻而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亦拜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廩食。”^{[6]《卷103《高车传》》}高车本是游牧民族,统治者“赐谷”、“岁给廩食”等行为有着更为深层的涵义,北魏统治者以此将农耕文明的信息传递至其统治区域的游牧民族中,以致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方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6]《卷103《高车传》》}的记载。

这些资料,都说明在北魏统辖的区域内,农业经济已渗透到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这是北魏经济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 都市建设与经济变革

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拉开了拓跋鲜卑大规模开发雁北的序幕。史载是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6]《卷2《太祖纪》》}，“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6]《卷2《太祖纪》》}。一个生机勃勃的北魏政权开始大踏步向前发展。

北魏定都平城及开发雁北历时近一个世纪。在城市建设上,平城历经2次大规模修建;在整个平城城市建设中,始终体现出北魏政权不断接受农耕文明的浸润,拓跋鲜卑从游牧经济转向农牧经济并重的历程。

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3代掀起了兴修平城的第一次高潮。“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民居,大筑郭邑。”^{[10]《卷57《魏虏传》》}当代学者研究认为,“道武帝居平城十二年(公元398~409年),完成京城主要框架与核心内容构织,形成一套城邑制度;明元帝在位十五年(公元409~423年),建筑苑囿、宫殿、祖庙、郭城等,确定平城总体格局。太武帝在位近三十年(公元423~452年),集中进行宫殿创新,皇宫、东宫布局固定下来。”^[11]

在建城过程中,史称“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6]《卷23《慕容廆传》》}。说

明其建设皆以有着明显华夏文化元素的邺、洛阳、长安等都城为蓝本。在效仿中原城市的同时,平城内部一些建筑又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史曰“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10]《卷57《魏虏传》》}装饰祠天坛的白帻、练裙、马尾带有浓浓的草原气息,祭祀礼节也都脱胎于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由此,北魏的都市景观呈现出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交融发展、异彩纷呈的景象。

孝文帝时期,平城迎来了修造营建的第二次高峰。在《魏书·高祖纪》中详细记载了太和元年(公元477年)至太和十七年(公元494年)包括各大宫殿及孔庙、明堂、太庙的建筑情况。^{[6]《卷7《高祖纪》》}说明孝文帝更加明确地吸纳中原文化。同时,因“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6]《卷91《蒋少游传》》}蒋少游、李彪等人奉命出使洛阳、江南学习,为改建平城涂抹上丰富的汉文化色彩。

平城建设在模仿中原城市的规制的同时,亦保留了草原文化的印记。定都平城前,拓跋鲜卑并无定居习惯,“昭成初欲定都于灑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6]《卷13《皇后列传》》}昭成,拓跋什翼犍,代国国君,道武帝之祖父;后乃什翼犍之母平文皇后王氏。建立代国后,什翼犍萌生定都的想法,遭致其母反对,平文皇后认为迁徙不定是拓跋鲜卑的传统,国基未稳之时,更需要有灵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迁徙为业”是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产物,游牧民族迁徙的动力来自于生存需要,为实现季节性牧场轮换或寻找更加适宜放牧的草场需不断更换驻地,历史文献中对游牧经济区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描述屡见不鲜,即是游牧经济形态下居住地频繁更换的体现。

农耕经济则不同。土地是小农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耕民族的生产活动围绕土地展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要求小农采取定居方式,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完整性。北魏统治者营建平城,实际上是对农耕文明定居方式的认可,是入主中原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

北魏经济结构变化的又一显著标志就是平城内部的里坊建制。天赐三年(公元406年),拓跋珪“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6][卷2《太祖纪》]}。《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10][卷57《魏虏传》]}坊里制度起自周朝,它是农业社会定居、管理需求的体现,可视为农业文明的符号。北魏平城内部建里坊建制,就是北魏游牧文化过渡到农耕文化在城市建设上的印记。

此外,分布在平城内的手工业者也是北魏前期经济转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作为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对土木、纺织等不甚熟悉,因此对中原的手工业者有非常大的需求。在北魏统治者从各地强制移民平城的大量人口中,“百工技巧”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来自农耕文明的手工业者不仅是修造平城最直接的劳动力,还从侧面展现了平城经济的风貌。史料记载说,平城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10][卷57《魏虏传》]}在这里,我们看到平城经济的多样化,特别是鲜卑人在城中享受到的经济生活体现了农耕社会。其中,贮藏谷米说明粮食富余,是耕稼活动的产物;织绫锦、酿酒、种菜或为农村副业,或为城市手工业;养猪羊、牧牛马显然有农牧结合的色彩。还有“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10][卷57《魏虏传》]}、“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等记录,^{[10][卷57《魏虏传》]}都可以视为城市纺织业的佐证。

三、平城经济结构调整评价与启示

平城时期北魏经济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变的过程。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在保留原有游牧经济同时,积极发展农业,经济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北魏政府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魏平城农业经济发展与政府迁都前后大规模移民实京活动密切相关。从统计数据上看,任重认为自道武皇始元年(公元396年)至献文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持续向平城徙民,总数累计超过85万口。^[12]日本学者前田正名认为,天兴元年从河北、山东迁徙约46万人,世祖时期从各地迁徙约50万人,4世纪末到5世纪中叶,这里成了“显著的人口密集区域,可以推测大约有100万人左右”^{[13][P85]}。李凭认为仅

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的人口就有约150万之众。^{[9][P353]}大规模移民平城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来自农耕区的技术工人成为都市建设的劳动力来源。

大规模的强制移民体现了北魏国家控制强有力的一面。如果说通过武力征讨掌控流动人口、安顿各地徙民依靠的是拓跋鲜卑强有力的铁骑,那么解决平城移民众多人口的衣食供养问题则成为北魏统治者骑下马背后所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发展农业经济势在必行。经济学认为社会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人们制定决策时面临取舍。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风貌都与其兴起之初的环境大相径庭。北魏前期,从四方迁移或归属的人口包括官吏、士大夫、自耕农、手工业者、游牧部落等成分复杂,原来单一的游牧经济也不能适应新人口结构的需要,因此,政府必须审时度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农业、农牧结合就是此时北魏统治者在新形势下面对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作出的权衡取舍。政府移民平城是推动北魏农业经济发展的人为因素,在“各给耕牛,计口授田”政策的激励下,来自农耕区的汉族移民有力地推动了京畿地区农业的进步,耕稼种植活动在雁北得到推广。与此同时,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辅相成、交错发展,逐步形成农业与畜牧并重的局面。

北魏国家控制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效果显著,但是另一方面,其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未能考虑平城地区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

魏晋南北朝正值我国古代气候寒冷期,“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6][卷82《祖莹传》]},寒冷干旱是这一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平城地处雁北,“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10][卷57《魏虏传》]},自然环境并不适宜过度开发。史书中有关平城风沙雨雪气象的记载屡见不鲜,如太武帝时期“世祖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风,宫墙倒,杀数十人”^{[6][卷112《灵征志》]}、“(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十二月,京师大风,扬沙折树”^{[6][卷112《灵征志》]}、“真君元年(公元440年)二月,京师有黑风竟天,广五丈馀。”^{[6][卷112《灵征志》]}又如孝文帝时期,“高祖太和四年(公元480年)九月甲子朔,京师大风,雨雪三尺”^{[6][卷112《灵征志》]}、“(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五月壬寅,京师连日大风,甲辰尤甚,发屋拔树”^{[6][卷112《灵征志》]},风力之大足以摧墙折树,并伴随扬沙、雨雪等恶劣

天气。雁北冷冽干燥的气候条件成为制约平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魏平城的农牧经济建立在一个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如果政府开发过激、调控过猛,容易突破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一旦出现水旱之灾,极易引起大规模饥荒。据史料记载,“太宗永兴中(公元409~413年),频有水旱”^[6]〔卷110《食货志》〕,“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饑”^[6]〔卷110《食货志》〕,“至天安、皇兴间(公元466~470年),岁频大旱”^[6]〔卷110《食货志》〕,“(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大旱,京都民饥”^[6]〔卷110《食货志》〕。能否说,平城时期北魏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国家上层调控密切相关,大规模移民平城无疑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经济从游牧走向农耕的步伐,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一环,但雁北地区能否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强有力的国家控制是否存有违背经济规律的一面,都是当代研究北魏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北魏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除了以往提到的政治经济因素外,平城的环境压力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结 语

综上所述,平城的地理位置在古代长期处于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沟通交融的过渡带上。在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以前,其以游牧经济为主。北魏建立后,经济发展日益显示出重视农业、维持牧业,农牧交错发展的倾向,经济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北魏初期在盛乐、河套、繁峙等地组织发展农业生产,道武帝3次推行离散诸部政策,成为北魏国家政权迅速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推力。统治者所采用的便宜行事,保留了游牧民族原有传统的措施,补充着农业经济的不足。平城的城市建设始终体现出北魏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但也一直保留有草原文化的特质,使平城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北魏政府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模式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经济发展超越环境承受能力时,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北魏最终迁都洛阳应当是其应对环境压力时的又一个重要抉择。

参考文献:

- [1]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张志忠. 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J]. 晋阳学刊, 2008, (2).
- [3] 张喜斌, 王普军, 徐国栋. 大同北魏太官粮窖遗址出土的战国秦汉瓦当 [J]. 文物世界, 2009, (6).
- [4] [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晋]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6] [北齐]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 白翠琴.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 [8]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9] 李凭. 北魏平城时代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0] 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1] 张焯. 平城营建始末 [J]. 沧桑, 1995, (1).
- [12] 任重. 平城的居民规模与平城时代的经济模式 [J]. 史学月刊, 2002, (3).
- [13] [日]前田正名. 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Pingcheng of the North Wei Dynasty

WU Xiao-liang, CAO Yu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Pingcheng of the North Wei dynasty found expression mainly in the shift from the nomadic economy to the agro-pastoral economy. After the Tuoba Xianbei controlled the Central Plains, they promo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le trying to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al nomadic economy. Their multi-approach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helped consolidate their regime but also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anization” of the minority groups in north 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Wei, the J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dynasties, which has exerted much influence on the la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North We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ode.

Key words: Pingcheng of the North Wei dynasty; nomadic economy; agro-economy

(责任编辑 伍琼华)